



方之

作品选

B243127

I247.7
494
3

方之作品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A 853370

封面设计：柯 明

方之作品选

本 社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34,000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600 册

书号：10100·480 定价：1.20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目 录

曲折的道路（代序）	叶至诚（ 1 ）
兄弟团圆	（ 27 ）
组长和女婿	（ 38 ）
乡长买笔	（ 64 ）
在泉边	（ 82 ）
曹松山	（ 94 ）
浪头与石头	（109）
杨妇道	（161）
岁交春	（170）
出山	（182）
看瓜人	（194）
柳营小记	（211）
南丰二苗	（223）
难写的人	（243）
栽草记	（256）
阁楼上	（279）
内奸	（294）
江心（三幕八场话剧）	（326）
我的创作体会	（394）

悼方之同志	巴金(404)
一团燃烧的火	李艾华(407)
——悼念亲人方之	
我们的悼念	刘维震 沈达义(410)
一个战士倒下了	陆文夫(413)
——哭作家方之	
痛悼方之	高晓声(416)
忆方之	叶至诚(418)

曲折的道路

(代 序)

叶至诚

去年这个时候，开过了方之的追悼会，好些熟悉方之的同志就匆匆赶往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去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愿望、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迫使我坐下来，为方之写一点较有系统的纪念文字。十年浩劫之后，幸存者都拿“活着就是胜利”这句话来相互庆贺，相互激励，方之不幸，第一个走了，走得如此仓促；在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群里，方之的作品和作为，功过过，褒褒贬贬，引起过举国瞩目，而今既然已经允许吐露真情，怎能不在他理当盖棺论定的时候，把他的为人和他走过的道路，如我所知地公诸于世？我既怀着难忍的悲痛和我的同伴告别，也怀着坚定的信念，相信他将作为和我同时代人的代表之一，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然而，真正要写系统的纪念文字，哪里能离得开作品？方之是个诚挚的人、诚挚的作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不曾编造过谎言，他的每篇作品都为他走过的道路留下了真切的足迹。今年，为编辑方之作品集，我从头阅读了他保存下来的文字，有可能弥补一下当时的不足了。我不是文艺评论家，没有什么理论，就好象方之生前，常常拿了一篇新作来让我“品品味”的时候那样，不过是咀嚼一番之后的随想，加上平时对方之的了解而已。

很长一个时候，我总以为方之是解放以后才开始写作的。第一次接触方之的作品，我惊讶他对农村的热爱，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后来知道，他虽然不是农家子弟，童年时代却有了一段难忘的农村生活，并且就在那里滋生了对文学的兴趣。方之出生在南京，祖籍湖南湘潭。抗日战争时期，他家到湖南农村避难。当时方之才念到小学二年级，一度失学在家。他的父亲也一度失业在家，没有事情，就教方之作文，方之的从事文学，最初便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只有小学毕业，做过店员，然而却爱好文学，曾经给方之出过《起风》这样一个颇有文学意味的作文题。他们居住的那个庄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庄子附近有个场地，场边长着枣树，结了许多红的、青的大枣。六、七月份，刮风响雷起闪的时候，枣树底下最热闹了：枣子象雨点一样落了一地，主人着急，小孩子们都来拣，一边拣一边吃；主人越急，孩子们越吃。方之就描写了这个场面，受到他父亲的赞扬；这赞扬触发了他观察生活的浓厚兴趣。如果说创作需要某种天赋，方之的天赋就在这样的作文里萌芽，滋长。

抗日战争结束，他们家重返南京，方之进了中学。在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进行决战的年代里，他以单纯而虔诚的信仰，如火一般的热情投入了学生运动，参加了地下党。

纵观方之的作品，他属于偏重现实主义的作家，其实，倒是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好梦想，并且为实现梦想而行动。这个时期，他阅读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和文学书籍，特别是苏联和解放区的，书中如火如荼的斗争激起了他的向往，一个理想的，如梦一般美丽的新世界强烈地吸引着他。也从这时候起，他就开始用笔来配合亲身参与的政治斗争：写诗，写寓言，写散文，写小说；在壁报和校刊上经常有他的作品，间或也拿到报纸副刊上去发表。

解放那年，方之十九岁，组织上让他进大学去念书。他不肯，

心想：解放了，还耽在学校里念书吗？不，要革命！他要到农村，或者工厂，或者边疆去干革命！从四九年末到五五年，他大部分时间就泡在农村里，搞土地改革，搞青年团工作，搞互助合作，……回到抚育过他的农村，而且是和农民兄弟一起干革命，他真是如鱼得水，正如他后来写的：“那时我年轻、单纯、明快，心中和大地都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我在田野里，一边走，一边唱歌，用可笑的喇叭喉咙唱着心头涌出的歌，信口乱唱的歌。”他爱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想做一个中国的达维多夫。他读了赵树理的许多作品，想学着象赵树理那样，“在工作中找到主题”，来进行写作。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很快，他的语言、思想感情、生活习惯都带上了浓厚的农村气息；也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写出了和农民兄弟接触以后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兄弟团圆》、《组长和女婿》、《乡长买笔》、《在泉边》；用生动的语言，明快、活泼、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笔调，尽情歌唱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大地。然而，并不是信口乱唱，跟当时几乎所有的青年作者，甚至包括已经成熟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一样，每一篇都有极其鲜明的政治宣传意义，在方之，则更是紧密地配合了当时进行的各项政治运动。《兄弟团圆》配合土地改革，告诉人们：地主的剥削造成了某些农民兄弟之间的隔阂，要团结起来进行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也必然会消除这种隔阂；《组长和女婿》配合互助合作，告诉人们：要办好互助组这样一种滋生着集体主义的生产劳动组织，必须克服各方面的——包括最难克服的亲族关系方面的私心才行；《乡长买笔》配合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普选，告诉人们：干部必须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克服——即使是微小的，似乎出于公心的官僚主义，体现出人民的当家作主，而群众则是通情达理的。《在泉边》这篇的政治宣传意义比较间接，也配合征集义务兵，热烈地歌颂了勇于承担捍卫祖国义务的主人公的内心美。这些个政治观念确实是从方之心头涌出的，因为他绝对相信党和人民利益的完全一致，无

条件地接受了各项运动的指导思想，还因为他亲身参与了其中绝大多数的运动，用运动的指导思想去观察，去感受，去体验，最终证明了指导思想的正确。然而，这些个政治观念却又是一般的，既没有比运动的指导思想深入一层，更不曾稍有差异；而且，别的作家的作品，几乎同样在做类似的政治宣传。所以，这第一批短篇小说，方之的才华还好象被套在框子里一样，缺少独特的见解，独特的构思；还没有十分鲜明的艺术个性。

然而，方之毕竟是有才华的，他有细致的观察力，敏锐的艺术感和准确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样的才华使他能够在框子里边，把人物、场面、景色描写得真切而富有生气，象《兄弟团圆》里程家宝去找他久不来往的哥哥和解时候的心理活动，《乡长买笔》里在大槐树底下开普选会议的群众场面；还有的几乎要突破了框子，具备了超出政治宣传以外的思想意义，那便是两篇努力写出人物个性，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力作，《组长和女婿》和《在泉边》。《组长和女婿》着力刻画了顾盛这个一身兼二任的农村青年。他是互助组长，作为组长，他必须大公无私，不讲情面，才能把一个互助组搞得“又团结又义气”；他又是金大妈未来的女婿，作为女婿，他理当讨得金大妈的欢心，才能使他和小金的婚事顺顺当当；偏偏金大妈因为吃怕了独立撑持一个家庭的苦，十分算小，常常为了一点眼前的细微利益，和别的组员分歧，这就使小顾处在了矛盾的中心。他热爱新的生活，“捧了个互助组就象捧了堆鸡蛋一样，生怕碰了砸了的”；他又爱金大妈的女儿金小华，两人就要办喜事了，真是左右为难。在近乎“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形之下，小顾毅然选择了当众批评金大妈的不是这一头，果然风波顿起，金大妈终于退出了小顾那个互助组，而且立刻影响到小金和他的关系。方之在这场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解决中，细致地写出了小顾内心的彷徨和决断，痛苦和欢乐，懊恼和觉悟；有不少令人会心一笑的文字，譬如小顾在和组员们一起栽秧的时候，由于金大妈退

组结在他肚里那斗大的疙瘩，先变成了鸡蛋大，后来连鸡蛋大的疙瘩也化了，接着他写：

“……可是忙到黑，各人散了，一个人走在路上，肚里疙瘩又有鸡蛋大了。洗了澡，月光爬上了麦秸堆，要是往常，这时小金该又蹦蹦跳跳地来了，又想到那时候一起割麦子，一个前，一个后，小金一口气往前赶，辫子直晃，她那结实的腰身，她那被汗透了的紧绷在身上的花布褂子，就跟七月天滚圆的冒水的瓜藤一样，一股劲往上长，说不出的新鲜爱人。想呀想的，好牵心挂肠，这时那块鸡蛋大的疙瘩又变的斗大了。心里想：组呢也搞好了，小金呢也退组了。唉，要是那回批评轻些，恐怕一下也崩不了。想呀想的，心里象开了油盐铺子样，洋糖、米醋、咸盐、辣椒，行行都有。不由叹了口气：‘我这叫蘸了洋糖吃苦瓜！’”

正是象这样真切、传神、饶有趣味的描写，把个小顾天真无邪、积极可爱的性格活生生画了出来，给人们以欢快的艺术享受；而小顾这位主人公的各种心理活动越是具体，个性越是鲜明，他经历的这场公私矛盾就越有普遍的意义。新社会里，岂止在办互助组上有这样的矛盾呢？人们从这里得到的启示，无疑超出了应该有怎样的胸怀来办互助组。这一篇里，还有若干显得一般化的文字。方之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叙述金大妈退组以后如何跟私心极重的中农搞在一起，如何吃了亏，终于被抛弃，最后还是靠大公无私的互助组来排除急难。这就和好些描写单干户怎样得到了实际生活的教训，认识并且参加了互助组的作品差别不多了。

比起《组长和女婿》来，《在泉边》则更高了一筹，更接近于突破了框子。在这里，征集义务兵被推到了背景上去，着重写青年人在选择对象中显示出来的品格，从而主题意义也成为：究竟怎样的人才值得爱呢？外表美的，还是内心美的？这样的主题在文学作品里并不少见，方之对这主题的开掘，也并不更深；然而，因为他对农村青年的十分熟悉，因为他描写的优美、准确、生动、明

快，给人们带来了极其新鲜的感受。

全篇除叙述故事的“我”以外，只有三个人物，其中崔福来是作为陪衬的。方之写了他“有文化，又会唱又会跳”，“剪分头，衣服也讲究”；写了他在批准应征的通知没来以前，“还有说有笑有板有眼的，一接到通知，就变了卦了，说是他妈思想不通”，“原来他又做道士又做鬼，他妈哭着拖后腿，是他叫装出来的，崔福来自己不愿去，因为他迷上了一个姑娘”；还写了他后来天天往泉边跑，问刺猬姑娘柳家秀：“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去？”最后写他躲在黑里听小铁牛和刺猬姑娘谈话，一被发现就溜走了。就这样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金玉其外的形象，用来给小铁牛和刺猬姑娘之间的爱情以波澜曲折、以反面的烘托。腾出笔墨，精细入微地描写了两个象泉水那样闪闪亮亮、叮叮当当的农村青年——小铁牛和刺猬姑娘间的爱情的序曲。我总觉得，写不写得好农村青年的恋爱，往往是对许多不是农村出身的作家的一个考验，考验得出其熟悉农村的程度。方之的描写是很成功的。他精心选择了小铁牛和刺猬姑娘在泉边那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三次见面的三个场面，每个场面都准确地、精到地写出了他们两个在特定情景下各自的心理、语言和动作。

第一次见面可以称做爱情的透露，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小铁牛吃不准对方的心意，又不善于表露爱情，欲语又止那种甜甜的尴尬情景和他憨厚、耿直的性格；也写出了刺猬姑娘心领神会，带些挑逗的神态和她爽朗、泼辣的性格。

第二次见面是在接到了批准应征的通知，而且小铁牛知道了崔福来之所以变卦是因为他迷上了刺猬姑娘之后；刺猬姑娘的首先开口，表现出她的主动，可是，小铁牛由于对她的误会，说了几句憋气的话，就拔腿走了；走了又后悔，想回头又不好意思；发生了爱情的波澜。

我禁不住要援引方之描写第三次见面的原文，这是借小铁牛

的口叙述出来的：

“月牙贴着崖边，凉丝丝的。我正砍了根柳树条子从山上下来，一眼就看见她正在打水。我望了她一下，她望了我一下，她低下头去打水，我呢，站下了。隔了一会，她抬起头来先开了口：‘你要走啦，临走还不来帮人家一下！’你知道，她说话总是那么副腔调，还把辫子那么一甩。我想想就走了过去，弯下腰去提水。泉水透明透亮的照得见她的影子，她站在我背后，一双眼睛打量着我，闪闪惑惑地。打满了水，我想：走好呢，还是不走好呢？还是走吧！她见我抱起柳树枝子，说：‘慌什么？——砍这做什么？’我说：‘昨晚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的，临走要给合作社留个纪念，丢个想头。我们社里牛栏四周的树太少了，栽上这些，好给牛有个地方遮个太阳打个盹。’‘哟，就只你们想到了！’说了句，就蹲下去撕野花瓣瓣，撕了两三朵，又说：‘为什么不在泉边也栽上几棵？牛倒没忘，把人倒忘了！’……”

经过刺猬姑娘的表白，小铁牛终于明白上一回自己错怪了她。小铁牛接着叙述：

“……我正着急呢，她回身来拿起扁担就要走。我一把抓住扁担这头，说：‘停一停，哪来这么大气？’‘别拉拉扯扯的，想想你昨天那股劲，话讲了一半就奔，两条牛也拉不回来！哼，要不是怕你闹情绪影响了应征，我才不看你那副脸色呢！’她说着还是要走，可是劲头比刚才小多了。我抢下了扁担，忽然发现她打着赤脚，脚上满是露水珠子，说：‘看你这时还赤脚，不冷吗？’‘高兴，什么冷不冷热不热的！’背过脸去坐下了。我一笑。她说：‘有什么好笑的’‘怎么，笑笑也不行了吗？难怪人家叫你刺猬姑娘！’‘刺他是高兴！不高兴的话，我眼角也不望他。再说，我那回说错你了？你自己嘴歪还怪镜子！’我无话可答，只好笑着低下头去挖土。‘做什么？’‘给你种棵树呀！’‘我才不感激你这好心好意呢！看，这下又把牛栏丢到脑后去了！’说着噗嗤一笑。……”

这一节双方爱情的契合，写得多么细致，多么逼真，多么美！

人们把《在泉边》看做方之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很有道理的。从《兄弟团圆》到《在泉边》，最初，人们还只是看到方之在框子里显露出来的才华，一步一步，人们看到了他的才华在尽力突破框子，脱颖而出。他逐渐更侧重于写人，逐渐更侧重于从高一层的角度来反映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品质；以至在主题意义上超出了政治宣传，在艺术构思上摆脱了运动过程。从栩栩如生的描写，人们感受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显露出作者的艺术个性。《在泉边》作为一件艺术品是相当完整的了。然而，方之这种突破框子的努力在当时还是不够自觉，不够稳定的，时而他又被框子拘束住了。譬如配合粮食统购统销写的《曹松山》，不仅在叙述上受了运动过程的拘束，思想上也受了运动中出现“左”的倾向的拘束。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五六年初，方之写出了他仅有的一个中篇小说《浪头与石头》。跟当时所有反映合作化高潮的文学作品一样，方之是站在反对右倾保守一边的，这是历史条件使然，可以搁在一旁，留待政治经济学家认真总结经验，正确估价那场运动的功过得失；也跟当时所有反映合作化高潮的文学作品一样，方之这个中篇里出现了以何顺江、余老头为首的一群贫农、下中农——互助合作的积极分子，出现了在合作化的道路上摇摇摆摆的富裕中农刘世荣夫妇，出现了党内右倾保守的领导县委石书记以及出于阶级本性对抗合作化运动的富农分子黄胖。尽管这些人物中间有的也写得相当生动，但是，他们的遭遇和经历，却和其他同类的作品大同小异，无非是在说明各阶级、各阶层在合作化运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证明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显不出多大的光彩。这是方之仍旧受配合政治运动的拘束的结果。不过，在《浪头与石头》里，还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那就是方之用来贯穿全局的团县委副书记戴荣。

戴荣是个所谓“卡”级干部，既忠实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又和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在上级的意见一致，而且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时候，一切风平浪静；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党内发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上级的指示精神和群众的愿望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处在了矛盾的第一线，首当其冲。方之用《包围和突围》、《救难口袋》、《提笔和落笔》这样几节（全文共七节），着重描写了戴荣在这种情形下的心理矛盾和思想斗争。起先，他领受了石书记关于“对自发社要坚决控制”的指示到白马村去了解情况。在白马村，他看到了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高涨的热情，碰了个从来没有碰过的钉子，非常之苦闷，成了个“愁眉苦脸的革命家”，只希望及早听到正在举行的省委会议的精神，能够满足群众的要求。然而，省委会议的精神却是：“不但要加紧控制，而且要砍掉一批”。上级的指示是那样，而自己这个党员的思想却是这样，明知自己肯定是错了，但心里的疙疙瘩瘩却消失不了。偏偏这个时候，团委组织干事来找戴荣谈思想问题；也是因为听说了省委会议的精神，心里有疙瘩的。这真把他难住了。他知道，自己是个党员，对方是个团员，自己是团委书记，对方是一般干部，自己心软却该嘴硬，要模范地贯彻上级指示。怎样来解脱眼前这个困境呢？突然，他想到了一个救命的办法，一连说了几个急躁冒进有害的例子。方之在这里写道：“谁说只有刘备才有三个救命锦囊呢？戴荣也找到了两个救难口袋！一个口袋尽是好例子好印象，另个口袋尽是一些坏例子坏印象，虽不能救命，却也能解难。当上级指示精神需要这个口袋时，就放开这个扎起那个，当上级指示精神需要那个口袋时，就放开那个扎起这个，这样，就把对方说服了。不但说服了别人，同时也弄通了自己。”如果戴荣是个对群众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见风使舵的干部，依靠这样两个口袋，自然可以左右逢源，保险终身，甚至还能青云直上。我们知道，当时有不少干部，甚至于高级干部，就是这样做的；后来便

有更多的干部，甚至于高级干部，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大都尝到了这两个口袋的甜头。然而，戴荣却不是对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愿望无动于衷的人。因此，这个办法仅仅只能解救他一时的急难。再一次到群众中去，再一次碰了钉子，那两个“救难口袋”就被事实这把“铁打剪刀”剪破了。回到县里，戴荣和他一向钦佩的石书记发生了冲突。石书记要他“多多加强些组织观念，少少出些花头点子”，还说：“我看我们有些干部，硬是可以叫做社会主义野心家！”他想不通，他想给上级党写信，可是，提起笔来，却不知道怎么写。因为他感到除非要求上级整个改变指示精神，群众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他也知道党章上明明白白写着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规定，但是，没有勇气落笔。最后只有向石书记请求另换工作了事。直到毛泽东同志肯定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戴荣才感到没有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坚决地支持他们；自己也有责任。

戴荣这个人物形象，虽然还不完整，在方之早期的作品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方之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他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感受和思考。所以会把戴荣来贯穿全局，也就是这个道理；在构思这个中篇的时候，他首先出现的人物，便是戴荣。前面说过，方之是个好梦想、并且为实现梦想而行动的人。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他犯过“左”的错误，办过象把青年人单独组织起来，搞集体农庄，吃大锅饭之类的事；为了这个，他赔上了自己的津贴和衣物，还诚恳地做过检讨；其后，他又亲眼见到不少类似戴荣在白马村所见的事：群众有办合作社的强烈愿望，偏偏上级不批准，只得暗地里办自发社；他同情群众的要求，却不敢予以支持。五五年批判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促使他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敏锐地觉察到不能单纯依靠上级的指示精神来干革命了。如果自己所有的，仅仅只是两只“救难口袋”，上级指示精神需要哪一只，就放开哪一只扎起另一只，象这样来弄

通自己，说服别人；那么，要是上级的指示精神不对呢？真正的革命者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来。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形之下出现的崭新的命题，也是方之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提出的发人深思的命题，他借戴荣的形象来表达这个命题。象这样的命题，在方之的作品里，还是初见，在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里，所见也并不很多。可惜的是，方之用了更多的篇幅去描写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动态，以证明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分散了他对戴荣这个人物的集中注意；对戴荣的人生道路、戴荣的命运探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却半途中止，以致使戴荣的形象显得比较单薄，命题的开掘也就不够深了。

方之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象《在泉边》那样在艺术上的追求和突破，象《浪头与石头》里戴荣形象那样在思想上的追求和突破，已经到了必须断然摆脱被拘在框子里的文学，拿出有独特见解，独特构思，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作品来的时候了。那时候，文艺界的许多同志也同样有这种要求；从五五、五六年起，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五七年上半年，便出现了文学创作十分活跃的局面；在方之，便有了参与筹备“探求者”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事件。“探求者”提出的所谓“严肃探讨人生”的文学主张，具体地说，就是：即便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也必须注重写人，注重写真实的人，注重写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里的命运，也就是人生道路。方之根据他自己的实践，相信这样的主张能够使他完全从框子里跳出来。

在五七年上半年，方之发表的作品，只有一篇《杨妇道》。《杨妇道》在方之的短篇小说里算不得上品，然而，也可以看出他在摆脱配合政治运动，摆脱写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转向着重于描写人物上所做的努力。小说里写到的象把粮食藏在床上褥子底下、向公家闹救济、半夜里偷偷烧饭吃之类的事，原是在粮食统购统销运